

王传明 曹茜 / 选注

谷城峰下晚霞沉，黄石楼头暮雨深。
正见飘飏生远岫，旋看飒沓满平林。
朝廷可下捐珠诏，田野空为种豆吟。
纵获西成民已困，只应重雨悯阳金。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LIDAIMINGJIAISHIWENXUAN



济南出版社



于慎行诗文选

I222.7/20

:8

2009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王传明 曹茜 / 选注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LIDAIMINGJIASHIWENXUAN

诗文选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慎行诗文选/王传明,曹茜选注.—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9.4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ISBN 978-7-80710-763-7

I. 于… II. ①王…②曹…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明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7397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45×21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61千

定 价 45.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总 序

李永祥

唐玄宗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时年三十岁的杜甫东游齐州（即今济南）。是年春夏之交，他陪同其祖父杜审言的挚友北海太守李邕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宴请济南士绅。是时，南边的一带青山白云涌起，凉爽的风从湖面碧绿的荷丛中吹来，驱散了亭中的暑热。悠扬的丝竹和歌姬婉转的歌声飘荡在湖面上，良辰、美景，贤主、嘉宾，激发了杜甫的诗兴，他即席赋咏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诗中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腾誉人口，素为济南人引以为荣，用现今的流行语言说：诗圣杜甫无意间做了济南的形象代言人。

济南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上古而至近日，历代名士辈出，灿若繁星，绵延不绝。其中不少名士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业绩卓著，而且沾溉后世、影响深远。济南名士多，确实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最突出的特色。诗圣之语，非虚誉也！历代名士留下了许多著述，这是济南历史文化的瑰宝，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整理出版这些文献，是深入研究、弘扬济南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是加强济南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高济南文化品位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同时它们虽是地方文献，但又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故而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长期以来,除少数特别杰出的名家乡贤如李清照、辛弃疾等受到重视并得到充分研究外,多数济南名士的著述堆在旧书库里,无人问津,有些甚至鼠咬虫蠹,残损遗失,令人遗憾。故而抢救、整理这些宝贵文献也是迫切的、刻不容缓的。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早就有志于此,当然在目前市场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做这个工作是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困难的。他们基于对家乡文化建设的使命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济南名士著述中精选出十家,并诚邀当代济南文史名家,进行编选校注,奉献给济南人民。应该说从事这类研究和出版是付出多而获得少的,是一种难得的奉献精神,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丛书的顺利出版也得力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济南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以及具体的关心和支持。这项造福当代、沾溉后人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表现出意义的深远和重大,它也是对即将在济南召开的全运会的重要献礼。

济南出版社这批推出的名家选集是确定了很高的标准和严格的体例要求的。首先是作者的遴选,要求作者必须是省、市知名的文史专家且对选题及济南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力求做到是当代名家选注历史名著。而对作品的精选要求充分体现作者时代和美学特色,注释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要简明通俗,以适合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理解。还要有对作者生平介绍的资料以及对作者成就价值的综合评介,以帮助读者能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特色,为理解作品奠定基础。这是统一的要求,应该说现已推出的每种选本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基于每个选注的

作者具体情况不同，体例上又有所变通，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古今注本众多，乃至不可枚数。故而，此种选本不以注疏为重，已故的徐北文先生在每篇诗文之后都附写了简明的品评文字。徐先生不仅对济南二安有深入研究，且他精于古诗词写作，所以他的品评不仅多有创见，发人所未发，而且当行不隔，分析鞭辟入里，是其他同类注本不能取代的。另外，有的著述前人从未进行整理，故以校注为重，同时附录作者年谱或年表帮助读者了解作者，这也是前人没做过的工作，这样，选本也就具备了独有的特色和价值。此外，有的作者的作品能编年的按编年排列，如李攀龙；不能编年的按体裁分类编排；有的作者除诗文之外还选了些词曲名篇，如李开先。总之，各种选本体例不尽相同、有所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作者的特色，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所以，应该说体例的变通也是丛书的一个特点。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集》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济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将会推动济南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为此，我向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丛书的作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敬意，我殷切地期待着其他济南名士的著作能尽快陆续出版，形成完整的系列，将这项意义重大的济南历史文化的系统工程做得更快、更好、更完美。此可谓：利在当代，功存千秋。是为序。

2009年2月写于樗居

前言

于慎行是明代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政坛人物、学者和文学家，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政治地位方面，他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定，可谓达到了文臣之至高点。在学术方面，他“明习典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明史》本传）、“博通端雅，表仪词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冯尚书琦》），给世人留下了《谷山笔麈》《读史漫录》《史摘》《兖州府志》《东阿县志》等著作，涵蕴精湛，足堪深研。但同时，于慎行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著有《谷城山馆诗集》二十卷、《谷城山馆文集》四十二卷。《明史》本传谓：“神宗（万历）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兹仅就于慎行的诗文成就，略作论述。

—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又字可远，号谷山（又作谷峰），明后期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今为平阴县东阿镇）人。

东阿于秦代立县，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方。它东距五岳之首的泰山只有二百里路。在县城东北三里，矗立着著名的谷城山（又名黄石山），它与秦汉之际的张良有关。据《史记》记载：秦末张良流亡下邳，遇圯上老人，授以兵书，并说，尔十年后从征过济北，谷城山上黄石即我。以后果然。张良熟读老人所赠兵书，佐刘邦定天下，终成一代帝王师。东阿又为三国时期大文学家曹植的封王之地。在县城以西十里，鱼山纵卧，为曹植在东阿期间所常登临者，死后即葬于山之西麓。另，曹操早期的重要谋士程昱亦为东阿人。县城东南二十余里的大寨山，即《水经注》所说的“大嶷

山”，狼溪河出焉，流经东阿县城，北入济水（今黄河）。凡此种种，皆对生长于此地的于慎行的为人、为政、为文，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

东阿于氏，为汉代“东海高门”于公、于定国之后。明初奉诏，自山东文登县迁至东阿。慎行之父于玘，以儒生起家，以举人身份历任河南许州知州、陕西静宁州知州、平凉府同知，以廉能著称，著有《册川先生集》六卷。仲兄慎思，诸生，国子监生，才华洋溢，著有《庞眉生集》十六卷。三兄慎言，举人，才学高妙，著有《冲白斋存稿》三卷。母亲刘淑人，生长名门，亦知书能诗。于慎行的外家，为本县苦山村刘氏，也是一个官宦、书香世家。其外曾祖刘约，以进士高第官至河南参政，著有《黄石吟稿》。外祖刘田，进士出身，官至户部员外郎，著有《东溪存稿》。外叔祖刘隅，嘉靖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著有《家藏集》《治河通考》等。于慎行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中。

于慎行自幼沉静、聪慧，深为街坊、亲友喜爱。八岁那年，邻家筑屋，慎行往观，有长者出一上联试之：“磨砖铺地。”慎行立即答对：“炼石补天！”识者谓其自幼即有宰辅气象。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一时名满东省。

隆庆二年（1568），慎行二十四岁，高中进士，自此走上了仕宦之路。但他的仕途并不平坦。这一方面是因其性情正直、操守坚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事纠葛、朝政昏暗：先是张居正与高拱互相倾轧，继之张居正专权十年，尤其是后来万历帝怠忽朝政。所有这一切，都使志向远大的于慎行难以有所作为。但尽管如此，仍有数事颇可称说。

万历四年（1576）正月，御史刘台以上书言事忤张居正，被廷杖，囚于广慧寺中。由于张当时已任内阁首辅，权倾朝野，百官皆避匿，慎行独不惧，前往广慧寺看望刘台，与共朝夕（据《明史》本传等资料）。

万历五年(1577)十月,张居正之父卒于江陵。按传统礼制,张居正应当回乡奔丧,守制三年。但由于贪恋权柄,张竟破天荒地要“夺情”(不回乡守孝)。这让接受儒家教育的百官难以容忍,纷纷上疏反对,结果是轻者被贬,重者遭受廷杖之辱。于慎行不畏强权,仍上疏论之。居正怒曰:“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据《明史》本传)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有诏抄没张居正之家。时张居正已卒,以前与张有隙者皆拍手称快,纷纷上疏揭发张的罪恶。于慎行亦曾因得罪张居正,被迫回乡闲居数年,张死后才复官回京。按理,他也应该推波助澜,加入到讨张行列。但于慎行没有这样做。被派往江陵执行抄家任务的,是刑部侍郎丘橈。丘这人很“绝情”,于慎行恐其做得过分,特作长书一封与他。在信中,他客观地评价了张居正的功与过,认为当时争颂其功,与今日争言其过,皆非实情。张虽然有所受取,但比起严嵩、冯保来,要稀少得多,不宜过分株连,以免全楚公私皆受其累。再者,张的八十老母在堂,诸子迂弱书生,望留以聚庐之居,以上推主上帷盖之恩,下全大臣簪履之谊。此信传出,举朝皆钦其胸襟仁厚、处事公正(据《明史》本传等资料)。

在礼部尚书任上,于慎行为皇长子出阁讲读事,为早立太子事,为皇帝勤政事,屡屡上疏,得罪了万历帝。乃愤而乞休,章八九上,乃允。于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返里,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家居生活。

家居期间,于慎行并未消沉逸豫,而是勤于读书著述。在此期间,其主要著作(《兖州府志》《读史漫录》《史摘》《谷山笔麈》《谷城山馆诗集》《谷城山馆文集》等)次第完成,从而使于慎行成为一代大学者、大诗人。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阁臣,首慎行,诏加太子少保,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赴任。数辞不允,乃就道。当时正值严冬,加

上于慎行素来身体不好，陛见后十余日即去世于京。讣闻，帝震悼，诏加太子太保，谥文定，以一品例祭葬。

二

中国的诗文发展到明代前期，出现了所谓的“台阁体”。它以歌颂为主，内容空洞，语言俗套，可谓病入膏肓，亟待振救。于是，在明代的正德年间，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派。他们认为，要扫清“台阁体”之肤廓，必须“复古”，向古人学习作文为诗之道，因而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李、何之后的嘉、隆、万时期，又出现了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派，比起“前七子”来，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高妙者，尚能雄壮峭拔，让人耳目一新；其末流，则对古人生吞活剥，故作壮语，远离性情。于慎行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

那么，于慎行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究竟怎样看待？他的文学主张又是怎样的？

《四库总目》之《谷城山馆诗集》提要谓：“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清代选家汪端亦在《明三十家诗选》初集中说：“庆、万间，李于鳞诗派盛行海内，无垢（慎行字）独心非之。”这就是说，于慎行不仅不走李攀龙等人的复古道路，而且还极力反对。众所周知，李攀龙曾提出过“乐府之拟议不能变化”、“唐无五言古诗”的观点，颇为自信，至有“微吾长夜”之自许。对此，于慎行一一加以批驳：

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辞声相杂，既无从辨；音节未会，又难于歌，故不为尔。然不效其体而时假其名，以达所欲出，斯慕古而托焉者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谷城山馆诗集》卷一《古乐府》小序）

余为五言古风，好学魏晋，非其质也。夫魏晋之于五言，

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向空洞，朴而不敢雕；轨途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古所谓“鹦鹉语不过数声”尔。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蘊，唐果无五言古哉？（《谷城山馆诗集》卷二《五言古诗》小序）

于慎行认为，唐代也有自己的古乐府和五言古诗，以抒情达意，只不过不像前后“七子”那样对汉魏机械模仿、生吞活剥而已。对于慎行的这两段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大家钱谦益认为：“公生当庆、历之世，又为历下之乡人，其所论著，皆箴历下之膏肓，对病而发药。”（《列朝诗集小传·于阁学慎行》）清代选家汪端也以为：“其论乐府、古诗，固属沧溟对疾针砭而所难及者”，“切中历下之病”。（《明三十家诗选》初集卷六《于慎行》）在其他场所，于慎行也不无针对地说：

古之修辞者，积閤而用膏，其神常应于有余；后之修辞者，入少而出多，其力常操于不足。有余者得诸心，故不厌为醇雅和平之调，而自不能已于高华；不足者怵于目，故愈务为瑰奇亢厉之音，而终不能脱于纤靡。此不可不辨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冯光禄诗集序》）

这无疑是说，那些摹拟叫嚣者实际上是学养不足、内蕴浅薄，可谓得诗文创作之三昧。在诗作中，他也曾对复古派加以抨击，例如：

开卷百年万里，连篇落日中原。

一任骚坛定霸，争教学海穷源？

（《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九《夏日村居四十二首》之二十二）

皮毛地模仿古人，动辄“百年万里”、“落日中原”者，居然就可以当诗坛领袖，那么有谁还去读书绩学？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于慎行以自己的不朽作品，赢得了当时与后世的赞誉。钱谦益谓：“公于诗文，春容弘丽，一时推大手笔。”（《列朝诗集小传·于阁学慎行》）《四库提要》谓：“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

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徇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清代选家汪端说：“文定诗清新圆美，绝去纤佻”，“非若公安、竟陵，于诗本无深解，倡为异议，不过欲据李、王坛坫而有之耳”。（《明三十家诗选》初集卷六《于慎行》）清末学者陈田评曰：“东阿论诗，洞达古今流变。《谷城山馆集》，音调谐畅，飒飒乎朱弦大雅之音。”（《明诗纪事》庚金《于慎行》）明末黄体仁曰：“余读其全集，奏疏类贾、陆，叙记似昌黎、眉山，赋咏在沈、谢之间，龙翔虎跃，蔚然已为词林冠冕。”（《读史漫录序》）其学生邢侗曰：“公起八代，还诸三坟，鸣镝大雅，振铎斯文。其为乐府，初夏松柏，秀劲风骨，苍茜色泽。其为声律，仙子鸣璫，肃远清越，错落琅琅。其为文章，水涣风行，渊然道德，溢于神情。”（《来禽馆集》卷九《于文定公谏词》）清初大学者朱彝尊至谓：

东阿格律和平，当正声微茫之时，能为是调，即以诗高选，亦堪作相。（《明诗综》卷五十六《于慎行》）

由以上所引诸家评论来看，于慎行在明代尤其是在明后期的诗坛上，其实具有很高的地位，我们今天应予以重新审视。

三

于慎行终生耽于吟咏，诗情诗意一直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第二生命。《谷城山馆诗集》二十卷，共收其诗大约一千三百五十首，皆系其中进士后至六十岁（1604）三十六年间所作（另收其赋六篇，未计）。

关于于诗的成就与风格，除在上一节中有所论列外，此处还可以引用一些前人的评价加以佐证。于慎行的忘年交、曾任礼部尚书的陆树声评曰：“若夫审其声以知其人，则其春容正直之养、硕大庄严之象、先忧后乐之怀，长王国而保黎民者，亦将于是乎有考焉。”（《谷城山馆诗集序》）而其学生邢侗的评论，则更为详细而多彩：

今略辨其诗：清静厌蹇，则孝子之处心乎？优柔温厚，则

君子之厝躬乎？钦严秀特，则太华之孤标乎？汪洋吐翁，则重溟之巨观乎？华粲蓂与，则霏瑞之卷舒乎？条流总统，则箭俞之集成乎？从盛明而出先生之业，就盛唐而出先生，伺窃谓：先生律绝、歌行等，取以拟盛唐，则先生与盛唐无两负；若以乐府、古诗而侔先生于盛唐，则盛唐犹似负先生者。此其故难言矣。降而论代，屈先生与李（梦阳）、何（景明）角，则李宜逊姿，何宜逊骨。不宁惟是。假令江东（王世贞）以喝野喷山之势而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垒；即起历下（李攀龙）而抵掌于黄石之次，历下不能无爽然于街勒而推先生国步乎！夫抗声文苑，则夔龙弗愈于马、班；正色台司，则李、杜或惭于伊、傅。何也？则以全力之难，而齿角翼足之鲜备也。（《谷城山堂诗草序》）

这段论述先拙绎了于诗的内蕴与风格，认为温雅秀特、蔚为大观；然后与盛唐比较，认为于诗毫不逊色于盛唐诸作；最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比，认为于诗亦胜过他们。这个评价虽无景仰之私，但大体上还是客观公正的。

关于于诗的题材、内容，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并稍稍举例证明。

（一）现实诗。由于于慎行的特殊身份（经筵讲官、值起居注、礼部尚书等），使他不能太多地、过于直接地在诗作中表现时事。但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性情又正直仁厚，目击艰难的现实，他也不能无动于衷。这方面的诗作虽然相对较少，但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如：

五月欲过犹未雨，秋苗渐槁青可怜。
白日火云但袅袅，半岩泉水空涓涓。
北来流离满道路，西望邑里疏人烟。
城头鼙鼓复不罢，敕史普天飞索钱。

（见其诗集卷十五《忧旱》）

时艰驿路多豺虎，民力秋原半草莱。

（见其诗集卷十五《夏日石楼夕望》）

幸借薄收供早税，忧天且释老农心。

（见其诗集卷十五《石楼观获》）

为语中人休错误，隍麋元不化黄金。

（见其诗集卷十五《新都程君房寄墨数螺，道中为税使所榷，戏作志感》）这几首诗的锋芒所指，乃是万历年间的一大祸害——税使。原来，那个急于朝政又贪婪无比的万历皇帝，为了更多、更直接地搜刮民脂民膏，向全国各地派出大量的太监（中人）充当税使，横征暴敛。他们所到之处，民怨沸腾。请看，天气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流离满道，如豺似虎的税使依然横行于驿路，到处索钱。他们蚊脚剔肉，蠅腹刮油，就连几锭徽墨也要征榷，这让黎民怎么存活？今日读之，其批判的锋芒依然熠熠生辉。

另外，抗日奏捷，他特赋《平倭奏捷歌》志喜（见其诗集卷五）；工部尚书朱衡治河功成，他为作《述大司空镇山朱公治河功成百韵》颂功（见其诗集卷十七）；蒙古归顺，边疆息烽，他写成《题忠顺夫人画像四首》示庆（见其诗集卷十八）。由此可见，于慎行是一个极为关心社会现实又极富正义感的诗人。

（二）游览诗。古人说，士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长知识、明事理，游览可以开眼界、拓胸襟。于慎行既饱读诗书，又喜爱出游。在京为官期间，他多次广游了北京名胜古迹。在家居期间，曾七次登岱、两次陟峰。所游之处，皆形诸吟咏。他还曾把游览岱畎的诗文编为《东游记》《岱畎行吟》两书。万历十三年（1585）秋，他以出差机会南下作壮游，饱览了六朝古都南京的名胜古迹。请看此行的部分诗作（皆见其诗集卷七）：

日暮倚兰桡，秋江正寂寥。

驿门斜对雨，郡郭远通潮。

急橹看商舶，寒灯见市桥。

隋堤前路近，欲听月中箫。

（《邵伯湖夜泊》）

白门通市里，传是古长干。
陌柳藏鸦曙，秋潮带雨寒。
横塘归客断，子夜旧歌阑。
别是繁华地，休将六代看。

（《长干》）

秋月秦淮岸，江声转画桥。
市楼临绮陌，商女驻兰桡。
云里青丝骑，花间碧玉箫。
不知桃叶水，流恨几时消。

（《秦淮》）

对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的热爱，以及初到南国的惊喜、新鲜之感，情与景的高度合一，使于慎行艺术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前人谓于诗清新圆美、春容宏丽，信然！

（三）闲居诗。京邸无事，或乡居闲暇时，于慎行也颇有“幽情逸致”。这类诗也不少。不过，作为一个士大夫，他的幽闲之中却仍然夹杂着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体悟。请看这一首：

闲居愁思转依依，邑里春深正阻饥。
深巷炊烟浑欲少，平田蔓草亦应稀。
中原“寇盗”还消长，海外兵戈有是非。
好在黄扉诸相国，从容调燮佐宵衣。

（见其诗集卷十三《春日闲居即事》）

虽曰“闲居”，却仍然“愁思依依”：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闾里炊烟渐稀，田间青苗更少，中原一带人民举义此伏彼起，朝鲜大地上，明军正与日寇作战。时局如此，叫他的一颗诗心怎能“闲”下来呢？再看这一首：

玄菟城头鼓角，白狼河北烟尘。
宵旰知劳“圣主”，安危定有谋臣。

（见其诗集卷十九《夏日村居四十二首》）

朝鲜境内和北部边疆正有战事，军书旁午，朝廷大臣固然尽心谋划，但那位“圣主”万历皇帝却“宵衣旰食”，更加劳累呢！我们知道，万历帝自万历十八年（1590）以后就贪图享乐，基本上不理朝政了，何曾“宵衣旰食”？于慎行这样写，无疑是在辛辣地挖苦他。

闲居之际，于慎行还对自己的人生屡屡反思，并作哲学层面上的思考：

乾坤屈指阅行藏，不是狂夫老亦狂！
宠辱百年身似梦，浮沉五亩醉为乡。
鹤鹏各自便高下，凫鹤谁能制短长？
回首昔游愁忆汝，淄尘偏染鬓成霜。

（见其诗集卷十四《闲居效长庆体》）

家住谷城山下，行踪半慕留侯。
初无黄石公授，但从赤松子游。

呼马呼牛易应，梦鱼梦鸟难分。
人世百年过客，勋名一片浮云。

巍巍汉庭作吏，盘跚鲁国为儒。
羞杀杜陵男子，笑倒高阳酒徒。

春日雕梁燕雀，秋风高冢麒麟。
贤圣谁能自免，身名何物为亲？

薰为含香自爇，膏因吐焰常煎。
臃肿能逃大匠，支离可尽天年。

（见其诗集卷十九《夏日村居四十二首》）

多年刻苦砥砺，换来的却是壮志难酬的幻灭感，就是在我们今天，也要替慎行惋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类诗篇却也道出了一种人世真谛——人生不过如此！从先秦的“庄周梦蝶”，到唐人的“邯郸一梦”，再到苏东坡的“人生如寄”，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决不能简单地以“消极”视之。于慎行晚年，曾在自己的《年谱画册》上大书“黄粱梦境”四字，可以与此类诗篇对读。

(四) 交往诗。这类诗篇在《谷城山馆诗集》内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来说,交往诗往往流于应付,缺乏真情,因而佳作不多。但于慎行其人深沉坚毅,实为深于情者,一生视朋友、同事如骨肉,一往情深。故发为诗,大多都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在他一生的众多交往中,关系至为密切者有数人,如长辈朱衡,同事沈鲤,朋友朱维京、于达真,晚辈冯琦、邢侗、叶向高等。与他们的赠答唱和,尤见其至性真情。请看与朱衡有关的二首:

上东门外一沾巾,别恨千重总未伸。
自古难酬知己遇,只今谁是报恩人?
即教寥落江湖日,转识安危社稷身。
渭水不须劳梦卜,已从高阁画麒麟。

(见其诗集卷十一《奉寄朱大司空老师》)

凄凉知己报,旧事总堪愁。
问字春风馆,传经夜月楼。
十年违撰屨,一夕叹藏舟。
惟有延陵剑,堪悬宰树秋。

(见其诗集卷七《朱大司空挽歌八首》)

于慎行十四岁(1558)中秀才,一时名声鹊起。次年,时官山东布政使的朱衡招之至济南官邸,使与其子朱维京(可大)共同肄业。数年间,朱衡不仅在学业上支持他,在生活上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于慎行十分感恩,终生以“老师”视之。在赠、悼之作中,于慎行一片真情,决非浮泛者可比。

于慎行为邢侗会试座主,邢侗终生师事之。但慎行视之如友,亦付出一腔真情:

十五年来系梦思,轩车何意到茅茨?
探春正及花开候,对酒还当月上时。
色动青天看倚剑,寒生白雪坐论诗。
芳尊十日君休厌,眼底交情更有谁?

(见其诗集卷十四《暮春邢侍御子愿命驾过访夜谈喜赋》)